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宋
元
明
清

巴蜀书社

译注 王晓波

审阅 倪其心

宋四家词选译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宋四家词选译

柳永 秦观
周邦彦 姜夔

(川) 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邓 南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插 图：刘明煦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宋四家词选译

王晓波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89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80523-358-6/Z·28

定 价：140.00元 (第二批50种)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607-6-6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宋代是词的全盛时期。柳永、秦观、周邦彦、姜夔，是两宋词坛上享有盛名、很有影响的四大作家。他们对宋词的发展和创造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柳、秦、周、姜虽然生活的年代不同，但他们个人的遭遇却有某些相似之处。柳、秦二人一生道路坎坷曲折，仕途极不顺利。周邦彦则是“浮沉州县”（《挥麈馀话》卷一），“飘零不偶”（《重进汴京赋表》）；即使还朝任职，也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京华倦客”；直到晚年，仕途才稍为显达。姜夔更是一生漂泊，以布衣终老。这些相似的

人生经历，表现在他们的词作里，有着某些相近的内容和类似的情调。如羁旅行役之愁，相思离别之苦，漂泊无偶之叹，怀乡念旧之感，等等。在词的艺术形式上，柳永首先开创了长调慢词，扩大了词所表现的领域，成功地在词里运用民间口语以及铺叙描述的手法，使词这种特殊的抒情诗歌形式，更适合于表现日益繁富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感受，从而在社会上获得了广大的声誉，引起了词坛的重视。秦观接受了柳永词的影响，例如他著名的《满庭芳》词，不仅在意境上与柳永的《雨霖铃》相似，而且，其中的“销魂，当此际”两句，就是“柳词句法”，因此遭到过苏轼的讥讽（见黄昇《花庵词选》卷二）。比秦观稍后的周邦彦，全面继承了柳、秦词的成果；而处于南宋后期的姜夔，则承袭了周邦彦的词风。但是，柳、秦、周、姜各自所处的生活背景不同，自身遭遇也不完全相同，他们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毕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四位词人在创作上都不是单纯地师承一家，而是博采众长，自铸新辞。他们在各自的创作道路上，都能超越前辈的畛域，各以不同的艺术风格并显所长，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因此，从柳永到秦观、周邦彦，从周邦彦到姜夔，四家文人词的创作，经历了一个递承发展变化的过程。

然而，尽管他们的词作都不同程度地扩展了词的题材，突破了唐、五代、宋初一般小令艳科的格式，改变了那种只抒发一瞬间情思的写法，但是，以柳、秦、周三人的词而言，他们的婉约词风，都还没有从“词为艳科”这一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姜夔虽然在婉约中另开清空刚健一脉，但内容上也是多写个人身世恋情，而且过多地像他写诗那样，把词当作了自己“陶写寂寞”的工具（《白石道人诗集自序》）。其次，柳、秦、周、姜四人，对词的音律都深有研究，皆是当行本色。他们的词，不仅协合音律，而且还都创制了新的词调。这是他们胜过晏殊、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之处。但是，从柳永到姜夔，由于讲究音律，注重词的格律化，并过分讲究写作技巧，而词风也逐渐趋于雅正（到姜词时，已将俚词完全排斥），因此，反映现实的面都不够广。只是他们之间，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四家词的题材都比较狭窄，不能与苏轼、辛弃疾等豪放派词人相比拟。对后世词坛，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在我们今天看来，四家词作都各自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瑕不掩瑜，他们在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特别是他们创造的写作经验和艺术技巧，一直都影响着后世的词家；而他们创作

的那些精美的、具有代表性的名篇，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诵，受到了普遍的喜爱，证明了它们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二

柳永（约987—约1053），字耆卿，崇安（今福建省县名）人。原名三变，字景庄。排行第七，故世称柳七。

柳永生活在一个有儒学传统的仕宦家庭。父亲柳宜，南唐时为监察御史，入宋后官至工部侍郎；长兄柳三复，次兄柳三接，也都由进士走上仕途。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青少年时期的柳永，也非常期望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可是，柳永的政治道路并不平坦。尽管宋初人才缺乏，录取进士的名额较大，但柳永却接连落榜。为此，他怀着激愤的心情，写了一首《鹤冲天》词，发泄怀才不遇的牢骚。据说这首词传入宫中后，引起了宋仁宗的不满，以致后来的一次考试，柳永本已通过，临放榜时，宋仁宗特地把他黜落，并且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柳永其时在四十岁左右。他在

如此沉重的打击下，于是自称“奉圣旨填词柳三变”（《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引《艺苑雌黄》），带着嘲弄的态度，怀着辛酸失意的情绪，走上了专力创作歌词的道路。直到景祐元年（1034），他才考中进士，相继在睦州（今浙江建德县）定海做了十多年的小官。后来改名为永，方得迁为京官，官至屯田员外郎，世人因此称他叫柳屯田。最后，死于江苏镇江的僧舍。

柳永一生不得志。死后，作品也散佚不全。他的词集名《乐章集》，在南宋时，还保存有九卷（据《直斋书录解題》卷二十一），到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仅有一卷存世（《彊村丛书》分为三卷），有词二百零六首，加上集外传词六首，共存二百一十二首。另存七言古风《煮海歌》一首，反映了盐民悲惨的生活。

柳词有三分之二以上为长调慢词。这种曲调舒缓的新声新词，对宋代的慢词，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他的小令、中调也写得非常出色，同样保持了自己的风格特点。

柳永风流浪漫，为举子时，便常为歌妓填词，科场失利后，他滞留京都，出入坊曲，遍游歌馆，还到苏州、杭州度过一段时间。他为了求得经济上的一些资助，为民间乐工歌妓创制了大量表现市民

生活情趣的慢词。其中，有蔑视功名利禄的《传花枝》、《鹤冲天》，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更多的词，反映了下层妇女的生活。例如《迷仙引》《倾杯乐》、《集贤宾》等词，描写了不幸歌妓对自由正常的夫妻生活的渴望。这些以歌唱为生的乐妓，卖艺而非卖身，但在社会的歧视和恶势力的摧残下，她们的遭遇往往是很不幸的。作者在词里，流露了对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歌妓的同情。还有不少词如《定风波》、《昼夜乐》、《击梧桐》等等，描写了这些下层女性爱情生活中的痛苦。作者创制的这些长调慢词，多采用生动活泼的民间口语，语意刻露，也不讲究含蓄，但它却以清新的面貌，一扫五代“花间”派以来的陈旧辞藻和典雅之风。如《定风波》写一个女子对她情人的思念，大部分篇幅都用女子自叙的口吻，大胆直露地道来。正是由于这种浅近无馀的写法，他的这类俚词，受到正统文人的轻视，被斥之为“词语尘下”，“声态可憎”。今天看来，柳永这些通俗词，表现的是新兴市民阶层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感情，比起专供统治阶级歌筵舞畔消遣助兴的雅词来，其进步性是明显的。至于柳永为迎合市民的低级口味，也有些歌词写得庸俗猥亵，像《菊花新》等，自是作者病态心理的一种反映，理应受到摒弃。

柳永抒写羁旅情怀的慢词，像《雨霖铃》、《八声甘州》、《夜半乐》、《凤归云》等，都是代表性的名篇。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題》中说：柳词“尤工于羁旅行役”。柳永这类近雅的词，情景交融，形神兼备，善于将身世之感，失意之悲，消溶于离情别绪之中，并利用自然景色的层层渲染烘托，使感情逐步深化。在发端、结尾、换头处，尤见功力；题意虽同，章法多变，而无雷同之病。小令如《凤栖梧》、《少年游》等，也写得耐人寻味，凄楚感人。苏轼曾特别赞赏《八声甘州》中“渐霜风凄紧”以下三句，认为“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畤《侯鯖录》卷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柳永生活的真宗、仁宗两朝，是宋代比较安定繁荣的时期，部分柳词描绘了当时的都市风情，反映了那个时期都市的繁盛景况。其中，有汴京元宵千门万户的灯火（《迎新春》）、清明前后的“万家竞奏新声”和“斗草踏青”（《木兰花慢》）；金陵、苏州、扬州、杭州等都市的“承平气象”，在他的词里，都“形容曲尽”（《直斋书录解題》）。范镇说：“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馀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祝穆《方輿胜览》卷十一）。这些词作，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有一定的史料意义，虽然作者对生活

还缺乏深刻的理解，描绘的只是一种表面的繁荣。

宋词“至柳永而一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创制的长调慢词，音律谐婉语意妥帖，增加了篇幅，扩大了词的容量，在艺术形式上有着革新的意义。在写法上，柳永创造性地把传统的“赋”的手法运用到词中，铺叙展衍，不用比兴夸张，也能收到好的艺术效果。在结构上，柳词能在铺叙中做到层次清楚而又富于变化，前呼后应而和谐完整，显示了柳永驾驭长篇的才力。其次，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采用民间口语，而绝无晚唐五代词雕琢的习气。即使是那些反映游宦生活的近雅的词作，虽无俚俗之语，但仍是精炼的白话。以上特点，在《八声甘州》、《望海潮》、《雨霖铃》、《曲玉管》等词中，就不难看到。

柳词在当时流传最广，以至“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明柳词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易为普通市民所接受。它不仅为以后的文人总结了写作慢词的经验，也为金元的说唱文学和戏剧曲辞的创作，提供了足资借鉴和取法的营养。

三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后改字少游，

别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县）人，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进士。哲宗元祐年间，因苏轼的推荐，任太学博士，充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初年，章惇等新党执政，他连遭贬斥。徽宗即位，被命放还，途经藤州（今广西藤县），在光化亭内饮酒时猝死。

秦观出身于一个中落的地主家庭，他一生的道路坎坷曲折。熙宁、元丰期间，他屡试进士不第；入仕后，仕途也极不顺利。旧党得势时，他在洛蜀两党的斗争中因依附蜀党，虽备受攻击，但在元祐五年（1090）至八年（1093），在他一生中还算比较顺利和得意的。新党上台后，他受到牵连，遭受到了接连不断的打击。先出为杭州通判，赴任途中改贬处州（今浙江丽水）监酒税，又削职徙郴州（今湖南郴县），继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又徙雷州（今广东海康县），他和苏轼一样，愈谪愈远，一直到死。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诗、文、词均有名，而以词的成就为最高。今存宋本《淮海居士长短句》三卷，有词七十七首，今人还辑得三十餘首。“少游性不耐聚稿”（毛晋汲古阁《宋六名家词》本《淮海词跋》），散佚的词当不少。

秦观现存词数量不多，内容单薄。他早期的